

## 破除「語言」的詛咒： 論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建構及其史觀\*

呂美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ibh5427@gmail.com](mailto:ibh5427@gmail.com)

### 摘要

王育德在 1946 年發表的〈徬徨的台灣文學〉文中提出了「詛咒」的疑問，本論文視此為他往後從事台灣話及台灣文學研究的原點，也是其嘗試重建台灣文學的立基點；並由此論析其在台灣文學研究上的成就與他的台灣文學史觀。首先，本論文指出，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與台語文字的建構，不該只放在「語言」範疇來看，而可視為他重建台灣文學所從事的奠基工作。第二，作為戰後首位在日本發表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的學者，王育德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於台灣文學研究史上有著先驅性的意義，值得重新受到重視與肯定。第三，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受台灣複雜的歷史發展影響，有著獨特的文學史流變。他提出清代即有台灣文學，而進入日本時代之後，它跟上世界文學的主流而呈現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戰後則延續此殖民地文學的精神，發展出與中國文學完全背道而馳的文學面向。第四，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的語言主體應該是台灣話；但他也提出即便以日語或中國話書寫，甚至未來的語言環境更加複雜，只要作者具台灣意識，則無論使用何種語言書寫，都是台灣文學。

關鍵字：王育德、台灣話、語言、殖民地文學、台灣文學

---

◎ 收稿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7 年 12 月 18 日。

\*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一、前言：被「語言」詛咒的台灣文學

王育德被譽為台獨教父、台灣話研究的權威，但其實他曾創作多篇文學與多部的戲劇作品，也累積不少台灣文學研究成果。即便《王育德全集》出版至今近二十年，但無論是民間或學術界對其文藝方面的成就都少有注目。<sup>1</sup>王育德從 1940 年代初期就讀台北高等學校之後，因兄長王育霖曾參加過學校的辯論部與文藝部，他也跟著加入這兩個社團（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188）。進入文藝部後，爲了鍛鍊文筆，他不僅參與刊物《翔風》的編務，也於該誌發表短歌、漢詩、小說、評論等作品。而戰後任職台南一中時期，他不但編導戲劇，且在龍瑛宗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版發表多篇台灣文學及文化相關評論；甚至流亡到日本初時、復學東大前的一段期間，他還跟作家中河與一學習小說的寫作（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296）。<sup>2</sup>可以說，1940 年代的王育德，其興趣志向都在文藝方面，而這多半源於北高時代的《翔風》經驗與校內的文藝風氣所影響（河原功，2014：98-17；岡崎郁子，2014：152-153）。<sup>3</sup>發表於《中華日報》的文章中，王育德最爲人所知的一篇即是〈彷徨へる台湾文学〉（彷徨的台灣文學）。此文幾乎每一段落最後都重覆了台灣文學爲何一再遭逢厄運的疑惑：

……雖然不知道台灣文學生來是什麼命，但我最近愈來愈覺得，台灣文學是不是受到什麼詛咒了？

……究竟為什麼在文學創作上無法成就豐碩的果實呢？這的確是一些後天的、人為的因素所造成，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折不斷，實在讓我不得不認為，台灣文學受到了很大詛咒。

……即便眼前有著豐富的創作題材，作家們也有強烈的創作慾望，但他們卻只能哀嘆弱小民族的悲慘命運而放棄寫作，這若不是被詛咒的命運，那又是什麼呢？

<sup>1</sup> 《王育德全集》由前衛出版社於 2000 年以降陸續出版，而目前研究王育德相關的學位論文僅有兩部：曾進民（2002）《王育德台灣語研究之成就》（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碩論）、余佩真（2006）《王育德的文學、語言、歷史觀之研究》（台北：北教大台文所碩論）；但還未有全面性的王育德文學研究。由台南文化局於 2007 年 2 月出版的《漂泊的民族 王育德選集》一書，除了重新翻譯王育德文學相關作品之外，部份文章爲新出土的作品。以下引用若是全集與選集皆收錄者，皆採選集之譯文。

<sup>2</sup> 例如《漂泊的民族 王育德選集》書題，即取自王於 1950 年預計書寫、但僅完成第一章「空中霸王」的長篇小說之題。

<sup>3</sup> 當時北高的文藝風氣塑成背景，以及《翔風》雜誌（1926.03-1945.07，共發刊 26 期）的創刊經緯，另可參考河原功（2012）〈解題〉，《翔風》復刻版（台北：南天書局）。

……聽說，前不久在台北公演的戲劇「壁」被禁演了，如果台灣文學今後也遭到一樣的命運，那它不是被詛咒的文學，又是什麼呢！（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23-225）<sup>4</sup>

台灣文學究竟受到什麼詛咒？王育德在文中如此補充道：

為什麼我們的文學如此萎靡不振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年輕人拚命地學習日語之故。台灣人花了四十年，才有辦法跟日本人一樣得心應手地使用日語……而今，台灣光復了。這些作家們肯定是興致勃勃地，想把日本時代無法碰觸的題材拿來大書特書一番。然而，欣喜與激動卻是如此短暫，因為他們好不容易才學好的日文被禁止公開使用，每個人都成為國語講習所的一年級生。他們得在「多聽、多說、不怕笑」的宗旨下開始學起，要到能掌握文學性的修辭方法，則得花費相當的時日。而就算這些台灣小說家學會國語了，但是等到能寫出和本國的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樣流暢的白話文時，他們早已被忘卻，而另一批新作家也已經取代了他們的地位。（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24-225）

亦即，王育德認為，台灣作家從戰前到戰後都得努力學習非母語的語言文字，而好不容易練就的功夫，若非變得無用武之處，便是不敵新世代的作家；換言之，作家們在語言上遭受挫敗，讓台灣文學無法開出美麗的花朵。而在他提出如此「詛咒」的疑問不久後，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也於《台灣文化》中發表〈文化在農村〉，其中即提出台灣白話文研究的必要：

關於台灣話，我自有一種意見，像我從小就沒有讀過漢文，因此我所寫的漢音常有不正確的地方，而我寫的漢文也常不清不楚，但是我一旦用了台灣白話式的話法，寫一篇土話文章給一般人看，人們都說比漢文更容易使人瞭解，比白話文（國語文）更能明白。像白話文裡面，有如「很」或是「夠」等字，由台灣白話文看來，是一種話渣，所以我主張除掉學校教育外，在一般文盲的農村大眾，應有研究台灣白話文的必要……（吳新榮，1946：21；粗體為引用者所加）

吳新榮的發言，被視為台灣白話文在戰後的文體變化軸上的定點座標之一（呂美親，2015：360）。雖然還是未完成式，但此台灣白話文，即是以台灣話作為語言主體所出發的文體。進一步而言，戰後初期，不少知識份子在遭逢兩度語文變革之後，都認為

<sup>4</sup> 原刊於《中華日報》，1946.08.22。陳建忠（2007）《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書題「被詛咒的文學」即取自此文。

有必要將台灣話加以改革成爲一種近代文體，以利教育或文藝等方面的普及。

而王育德明確地認爲，先天條件極佳的台灣文學，其無法產生優秀作品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出在語言。可以說，〈彷徨的台灣文學〉裡的疑惑與追問，成爲王育德流亡日本之後所從事的台灣民族論、台灣文學與民族語言相關的思想體系等建構工程之原點。那麼，王育德用什麼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而在他一邊研究台灣文學、一邊破除台灣文學的根本問題時，他又建構出怎樣的台灣文學？他的台灣文學史觀又是如何？這些即是本論文將探究的問題。

## 二、「文藝青年」王育德

王育德在回憶兄長王育霖的文章裡，如此告白自己曾有過的文藝大夢：

兄哥和我兩人都夢想著光明的未來，我們從小就立誓要成爲台灣的格拉古兄弟。兄哥說，憲法在台灣實施後，他要出來競選立法委員。我還一副悠閒樣地回他說，戲劇文化方面就交給我了，所以法律方面的事，就拜託你啦。（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27）<sup>5</sup>

1940 年代，二十初歲的王育德，其所夢想的光明未來乃寄於戲劇和文化事業。雖然兩兄弟就讀北高的時間完全錯開，但《翔風》中都可見他們的文學創作。<sup>6</sup>而後王育德如願跟上兄長的腳步考取東京帝國大學，卻因戰爭而被迫中斷學業。疏開回台後，王育德先在嘉義市役所工作，戰後初期則任職台南一中，期間除了在《中華日報》發表文章，也與黃昆彬等組織「戲曲研究會」，和不少台南的年輕學生從事戲劇活動（岡崎郁子，2002：228）；其中，1945 年 10 月於台南演出的王育德編演之《新生之朝》、與黃昆彬合作的《偷走兵》，爲戰後台語新劇的首度演出（徐亞湘，2015：77）；相較於北部以王井泉、簡國賢或宋非我等人爲中心的人人演劇研究會或聖烽演劇研究會在 1946 年後半所致力的台語新劇活動（徐亞湘，2015：77-78），幾乎早了整整一年。

文學史家葉石濤曾如此憶起：「我常跟王育德先生和好朋友黃昆彬、邱媽寅到中華日報社的宿舍找他（按：龍瑛宗）聊天，一談就是好幾個鐘頭，讓他犧牲了不少夜晚的睡眠。」（葉石濤，2000：54）、「除了我之外，另一個最活躍的日文作家是東京帝大學生

<sup>5</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6 期，1961.02。

<sup>6</sup> 相關記事亦可參考王克雄、王克紹編著（2017）《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台北：遠足文化）。

的王育德先生。那個時候王育德先生熱衷於推進戲劇運動，自己寫劇本，自己演主角，在台南『宮古座』公演了兩次。」（葉石濤，1996：44）<sup>7</sup>而當時的公演，據王育德自己形容：「贏得的掌聲幾乎震破場內，全場激動到最極致」（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35）<sup>8</sup>。由此可見，戰後初期的王育德在文藝之路的投入與活躍。特別是文學方面，葉石濤給予極其正面的評價：

我們常討論日治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認知不輸給我，更有深入而詳實的觀點。（轉引自余佩真，2006：12）<sup>9</sup>

王育德所寫的論評銳利而擊中要害，批判孔教和封建制度的相關關係頗有見地。（葉石濤，1987：75）

從引文可知，王育德自戰前對於台灣文學即有相當的掌握，特別是對 1920 年代以降的新文學運動，他已有相當深刻的認知及獨到的觀點。也因此〈彷徨的台灣文學〉一文鏗鏘有力，不僅點出台灣文學因時代更迭及官方政策而呈現發展一再受阻與斷裂的情形，更直指台灣文學無法「成就豐碩的果實」之根本原因，即台灣人總得拚命地學習別人的語言之故。

岡崎郁子曾詳論王育德的戰後初期思想與文藝活動，她認為王育德當時引介五四運動的思想，其自身也有興起文學革命的慾望（岡崎郁子，2002：231）。即便在戰後初期無論是在文學創作、文化評論或是戲劇方面都大展身手，二二八事件之後，身為台灣第一位檢察官的兄長遇難，而王育德自身也在文藝方面都對政府多有批判，為預防遭遇不測，只好選擇流亡。而後，他順利居留日本並復學東大，著手研究台灣史與台灣話之外，在他領導台獨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也繼續研究台灣文學。

最早在日本學術界發表台灣文學研究的，即是王育德。1958 年，東大博士生王育德，在日本中國學會第 10 屆大會發表〈文學革命の台湾に及ぼせる影響〉（文學革命對台灣的影響），此論文在翌年 10 月刊登於《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11 集，王育德提及張良澤謂此為戰後日本最早發表的台灣文學評論（王育德，1993：244）；而據下村作次郎的整理也顯示，這是戰後第一篇在日本學術雜誌發表的台灣文學研究（下村作次郎，1994：333；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2014：30）。

<sup>7</sup> 「宮古座」在戰後更名為「延平戲院」。

<sup>8</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15 期，1962.02。

<sup>9</sup> 此轉引自余佩真碩論。原出於葉石濤（1998）《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事業）頁 32。

在台灣島內還未正式開啓台灣文學研究的 1960 至 70 年代，王育德已在日本陸續發表多篇台灣文學的書評與台灣文學研究的論文。這些研究成果，終於在 1983 年集結成《台灣海峽》一書出版，雖然在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中也看得到對此書的引用，但王育德的台灣文學研究及觀點要在島內被廣泛閱讀和討論，或許要等到《王育德全集》中文版發行之後；而他的台灣文學研究，至今也還未受到較全面性的評價。<sup>10</sup>

### 三、為了重建台灣文學而研究台灣話

從王育德發表的台灣文學研究論文不難發現，「語言 / 語文」和「文學」的發展，在其思考脈絡裡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王育德於 1960 年在東京創設台灣青年會並發行機關雜誌《台灣青年》；《台灣青年》自創刊號即連載王育德執筆的〈台灣話講座〉，前後共刊登 24 回。作者在講座連載後的下一期發表了一篇補述，文中對部份讀者的疑問作出回應：

的確，會不會講台灣話和台灣獨立沒有關係。而台灣話的剖析和台灣獨立的主張並未直接聯結，這也是事實。但獨立運動高漲的前提，必須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高昂，所以有必要讓台灣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我相信寫這個講座，可為此事帶來助益。（王育德原著、近藤明理、近藤綾、中川仁編，2012：125）<sup>11</sup>

如此說法，讓許多讀者與論者將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與台獨運動劃上等號。「台灣話」的確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凝聚要素，且發揮了實質作用，而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與〈台灣話講座〉系列文章，也成為台灣「語言民族主義」的理論建構基礎。可以說，「語言、文化、民族、國家」的連結方程式，因為王育德的實踐得到確立。但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一環的文學，乃藉語言書寫、以語言承載，以文字形式呈現文化面貌，則王育德將台灣話與台灣文學研究加以連結，即是前述方程式中「文化」這個環結的焊接工程。

這個文化焊接工程的基礎，即是語言文字的研究與建構。在王育德正式發表台灣文學研究之前，他先以台灣話的研究活躍於日本學術界。1952 年和 1954 年，王育德分別完成大學畢業論文〈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和碩士論文〈ラテン化新文字による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而後陸續發表〈台灣語の研究〉（1954.02）、〈日本における福建語研究の現状〉（1955.05）、〈台灣語の声調〉（1955.08）、〈福建語の教会ローマ字について〉

<sup>10</sup> 例如余佩真碩論《王育德的文學、語言、歷史觀之研究》中，討論王育德的文學作品或歌仔冊與台灣話等研究，但未有從王的台灣文學研究之視角所切入的分析。

<sup>11</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39 期，1964.02；引文為筆者中譯。

(1956.10)等論文，並於1957年12月自費出版《台灣語常用語彙》一書(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75-276)。

大東和重指出，王育德對於台灣話研究的熱情，乃與其曾採集過「歌仔冊」、訪問過「歌仔戲(團)」有關；尤其兄長育霖於北高的學長中村忠行等人曾熱衷於歌仔冊的收集，如此也間接影響了自幼亦曾受過漢文教育的王育德(大東和重，2016：293)。這樣的背景固然重要，但若從王育德在戰後初期一連串的语言及文學相關的思考和研究，包括他提出清代就有台灣文學，即「歌仔冊」的主張(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38)<sup>12</sup>，以及他研究台灣話時，視歌仔冊為文學作品而以它作為考察文本的事蹟等(王育德原著、近藤明理、近藤綾、中川仁編，2012：80-100、108)，我們可以確認，王育德所從事的台灣話研究，不僅是對〈徬徨的台灣文學〉中的自問之實際回應，亦是他的台灣文學研究以及台灣文學史觀建構的基礎；以下詳論。

#### (一) 研究台灣話、建構台灣文學

曾致力於戲劇活動的王育德，非常期待台灣戲劇的品質能夠有所提昇，他把劇本視為文學作品，且將戲劇與文學視為並駕齊驅的藝術：

劇場裡的建物與設備，正是建築學與雕刻藝術的呈現，而劇本，則可謂一部夠格的文學作品；至於舞台設計，即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必須與戲劇渾然成為一體，才能將整部作品的思想呈現出來。

如此看來，作為藝術的一種類型，戲劇不僅能與文學、美術、音樂並駕齊驅，甚至毫不遜色。(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20-221)

然而，戰後至二二八事件前的一年間，認為「(當時廣義的)台灣文學的主體乃為戲劇」、創作多齣戲劇的王育德則感嘆，「可惜，能夠作為憑據的戲曲幾乎沒能留存下來，而當時我最切身感受的是，記錄台語的困難」(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38)。正如前述所言，〈徬徨的台灣文學〉文中，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發展受阻的問題出在語言，於是流亡日本的他，決定研究台灣話：

我決意研究台灣話的直接動機在於，立志要發明台灣話的標記法。因為，我透過戲劇活動而了解到，台灣話沒有適當的標記法的問題。(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

<sup>12</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28期，1963.03。

譯，2017：159)

這裡明白揭示了視戲劇為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主體的王育德，因苦於撰寫劇本時無法使用適當的台語文字，於是決意研究台灣話。而如前述提及，日本最早的一篇台灣文學研究論文，即王育德於 1959 年發表的〈文學革命の台湾に及ぼせる影響〉，此文後來收錄於《台灣海峽》，篇名改為〈日本統治下の苦闘—言葉と文学〉；文中不斷論述的，正是日本時代台灣人為了改革台灣話、建設台灣話文的歷史，以及這段過程的意義。其中提到 1920 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引進中國白話文並興起台灣新文學運動時，他如此強調：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民迫切希望整理自己的文字與文體，培育自己的文化。大陸白話文的普及提供他們良好的準則。那就是模倣北京話的例子，把口說的台語發展為書寫的語言，並加入文學、思想，以對抗強加於自己身上的日語和日本文化，保衛民族。(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44；粗體與底線為引用者所加)<sup>13</sup>

正因王育德對當時的運動方式有所質疑：「為了打倒舊文學，他們對大陸的白話文發出共鳴，並引進來做自己的武器，但白話文到底改變了多少台灣文化地圖，增加了多少文化人口卻是個疑問」(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49-250)，於是在該論文的一節又介紹了 1930 年代鄉土文學的論爭，並引用廖漢臣與負人之間對於「台灣話文」是否落實的辯論與各自的主張。

也就是說，論及台灣新文學運動時，王育德一開始就著眼於台灣話的文字改革；因為文字改革的成功與否，關乎台灣文化的版圖能否穩固、關乎文化能否真正普及於人民。而連載的〈台灣話講座〉裡，除了強調語言與文學的關聯性，同樣又再引用 1930 年代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爭時的主張；例如第 13 講「文言音、白話音和訓讀」中，即提到「從文學運動走向語言問題」與「黃石輝的具體提案」：

正面以台灣話的書寫法為研究對象，當然會遭遇這種棘手的問題。但我們的上一代，老實說並非一開始就下定決定主動面對這個問題，而是在廣泛展開運動試圖振興台灣文化文學之際才遭遇這個問題的。

(中略)

<sup>13</sup> 此文中譯版將副標「言葉と文学」(語言與文學)刪除。

黃石輝在上面提出的用字問題、語彙問題、發音問題，還處於很幼稚的階段，但都是一些根本問題，後來有許多人加以研討，一步一步地解決。（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139、143）

王育德認為，在知識份子試圖振興台灣文化文學之時，就會面臨台灣話書寫法的問題。但無論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或台灣話文運動，這個問題並未獲得完整的解決；甚且，他在戰後想以戲劇來振興台灣文化與文學時，就直接遭遇如何用台灣話書寫的問題，於是才有〈徬徨的台灣文學〉中提出的疑問。

雖然劇本未保留下來，但據王育德回憶，他當時是「用歌仔冊式的漢字來寫劇本」（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13）；而對於歌仔冊式的漢字文本使用，他提出如下見解：

用漢字標寫台灣話，必須運用訓讀、音讀、假借字、俗字等各種手段。……這樣當然會受到重視純粹性、只想從漢字當中汲取聖人心意的知識份子的唾棄（家父曾叱責筆者收集『歌仔冊』是王家子弟不應有的行為）。而不識之無的民眾，則看不懂這些特別為以自己為對象寫出來的通俗作品。「歌仔冊」只能成為說書人說書的底本，未能普及於一般民眾之間，理由即在於此。（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61）

從考察知識份子引進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爭論的過程中，王育德認知到台灣語文改革的重要性，且加上自己曾有苦於無法完整標記台灣話的經驗，他才投入台灣話的研究。但實際從事研究之後，王育德對於漢字無法普及一般民眾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反省，於是試圖改良台灣話的標記法。1950年代中期，他受當時興盛於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所啟發，而創造出第一套的羅馬字書寫系統，稱為「王第一式」（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61）。後來他又改良此方案創出所謂「王第二式」，1960年代的〈台灣話講座〉中即使用這套羅馬字（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60-162），並且提出「漢字和羅馬字併用」，即「漢羅合寫」的主張（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271-272）。

洪惟仁認為，「對王育德來說，台語研究—台語文字化—台灣獨立是三位一體，分不開的。」（洪惟仁，2014：91）<sup>14</sup>的確，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很直接的連結就是，台灣真正獨立做為一個國家時，在台灣最多人口使用的台灣話，理所當然要成為「國語」。一國之語建立之後，以此國語所創作出的文學作品與它參與其中的文化重建，也才真正得

<sup>14</sup> 原刊於《台語文摘》革新2，1992.04。

到獨立。這個部份稍後將有較細緻的引用與更精密的分析。而就前引之文可知，驅使他研究台灣話的動機，除了是從戰前的文學運動過程得到啓示，也是源於自己在創作戲劇時深刻體驗到台灣話無法完全標記的困境。也就是說，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與發明台灣話標記法，亦即促成台語文字標準化的動機與實踐，正是爲了建構發展受阻的台灣文學。

## （二）讓台灣文學的主體語言更精鍊

然而，台灣話無法成就文學，除了標記法的問題之外，另一個主因則是，連台灣人都認爲台灣話是「粗俗」的語言，無法成爲文學的載體。因此，對於以台灣話來建構台灣文學，王育德向文學家與劇作家提出呼籲：

部份台灣人對台灣話沒有什麼感情，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台灣話很粗俗。台灣話通俗的詞彙確實是怎麼恭維也說不上優雅。正因如此，台灣人必須努力使台灣話達到精鍊的境界。歷史告訴我們，馬丁路德以德語翻譯《聖經》，薄伽丘用意大利文寫成的《十日談》，莎士比亞以英文寫成的戲劇是如何地使他們的民族對本國語言、進而對自己的民族產生熱愛。台灣話如果有優秀的文學家和戲劇家不斷發表作品，也會漸趨精鍊。（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273；底線與粗體乃引用者所加）

由此可見，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另一個目的正是希望這個被認爲「粗俗」的語言能得到提昇。若有更多以台灣話寫就的文學作品，則台灣話就能更加精鍊地提昇至文學層次，如此可使台灣人因這些作品而產生對自我民族的熱愛，也會對台灣話投注更多情感，不但不會認爲它是粗俗的，反倒對它更有自信。

倒是，被譽爲台灣話研究權威的王育德，其以台語發表的作品目前只見兩篇，一篇是以 Ōng Jók tik 署名發表於《台灣青年》第 4 期的台語散文〈Guá wu khi Tapani〉（我有去噍吧哞）<sup>15</sup>，此文全以漢字書寫，但每個漢字上方都標上「王第二式」羅馬字；而另一篇則是台語詩〈現時台灣政治歌〉，約莫作於 1970 年代初期，以台語漢字及教會羅馬字對照的形式，印在台獨聯盟的宣傳單上。即便王育德的台語作品不多，但《台灣青年》中刊載不少台語詩（余佩真，2006：174-179），作者們受到王極深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

以下從王育德的台語散文〈Guá wu khi Tapani〉（我有去噍吧哞），來觀察他在語彙

<sup>15</sup> 此文在《台灣青年》第 4 期（1960.10）發表時乃爲獨立文章，而當期〈台灣話講座〉連載到第 4 回，所以這篇文章後來被作爲例文收入 1983 年出版的《台灣語初級》時，王育德將它視爲〈台灣話講座〉第 4 回的附錄文章，而書中則將原來的「王第二式」羅馬字改爲教會羅馬字。

使用與文字應用等方面的特色和意義。其中一段如下：

前擺的相戰中，我為著覓尋疏開去南庄的我的愛人，路有經過噍吧咩。

彼時陣交通機關真無利便，干但通靠家治兩枝腳行。透早坐火車，對台南去新市仔，佔新市仔落車，來就用的啦。入去大目降（作孽的叫做大粒幹），過那拔林，到左鎮，日就覓晝啦。

暴憑罕得行遠路，日呢曝，雨呢淋，雖然講是為著愛人，實在亦是真歹命，沿路行沿路念，為腔死，為腔走千里（這句俗語應該是，為錢死，為錢走千里）。

彼時的形狀，頭殼是戴籐笠那像草地人，兩枝白鴿鸞腳是縛キャハン，肩甲頭一平背包袱，一平背水罐。對此滿來給想，亦那好笑，亦那可憐。

到左鎮的路，算起來猶平坦好行，對左鎮覓窰入去南庄的路就歹啦，起起落落彎彎窰窰，中間有幾仔个足崎的崎。上崎的叫做揀死猴崎，覓孽這個著愛佔中站歇困一兩擺。這搭的牛車攏是兩隻著拖，亦有特別的車擋。聽見講，噍吧咩事件的當時，這搭的人攏附日本仔剿了了。（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16-117；□為引用者所加）<sup>16</sup>

首先，以台灣話創作，可說是保留台灣話的積極實踐。此文原來刊出時，每個漢字上方都附上「王第二式」羅馬字；而雖如引文中□的漢字明顯與現今的常用台語漢字不同，例如：「覓尋→欲揣（beh tshuē）」、「干但→干焦（kan-tann）」、「平→𠂔（pîng）」、「此滿→這馬（tsit-má）」、「窰→幹（uat）」、「孽→跔（peh）」、「困→暎（khùn）」、「附→予（hōo）」等字，但某種程度而言它們或許是當時的「常用」漢字，這樣的用字差異在文字改革過程中乃常見的現象。另外，「暴憑（pōo-pîn）」一詞為「平常」之意，是現今幾乎已少用但卻非常文雅的詞彙。

再者，比起現今的台語口語，這篇散文讀起來較為精簡而無太多累贅的語助詞或語尾詞；此可謂前述作者強調的「精煉」之落實。而例如「作孽的叫做大粒幹」、「為腔死，為腔走千里」等句，作者毫無忌憚地將所謂的「粗俗」或通俗詞彙寫進文中，能理解其中諧音之義的讀者，想必閱讀時要會心一笑；這種以俚語俗語呈現幽默的作品，在許多

<sup>16</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4期，1960.10；原刊出時，題目僅有羅馬字。「キャハン」漢字為「腳絆」，即綁腿。

經典的西方文學中並不罕見，也是引發讀者共鳴的關鍵之一。〈台灣話講座〉第 8 講也特別提到「關於詞彙的精煉」；其中，作者也承認「民眾生活中的口頭很粗俗」，因此建議在書寫或公開（如廣播）用語時，可選擇較文雅的用詞（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89-90）。所以，此文也可謂是作者對文學家或劇作家呼籲以台灣話寫作的自我示範。

綜言之，王育德試圖從研究台灣話來助益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並讓台灣話可因文學創作而能脫離粗俗且更加精煉。因此，無論是 1950 年代的台灣話研究或〈台灣話講座〉系列的寫作，這些工程的很大目的在於，為了解決台灣文學在語言方面受到壓制的問題。換句話說，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的確是爲了台灣獨立前的文化根源奠基，而文化奠基的前提正是台灣文學不再因語言問題受阻，而能得到順利發展。

而對於尚待建構、發展中的台灣文學，以及未來的台灣文學，王育德又是如何看待？以下以其台灣文學研究及評論爲例，來探討他的台灣文學史觀。

#### 四、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史觀

眾所周知，在東京從事台獨運動的還有廖文毅、史明等人，但全面地從事歷史、語言、文學研究的，只有王育德。即便台獨運動和台語研究佔據了王育德所有時間，使得其文學創作幾乎停滯，但他並未放棄對文藝的喜好，除了還有零星的文學及戲劇創作，也發表多篇台灣文學的評論與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大致收入出版於 1983 年 1 月的《台灣海峽》。作者在該書後記如是道：

我身為台灣人，身為一個在東京大學的大學部及研究所攻讀中國文學和語言學的人，較其他人倍感責任之大，一直以來都研究著台灣的語言、文學和歷史。對我來說，這三個領域相互關連，所以我的研究也是同時交叉著進行。歷史和語言的部份已有專書集結，最後就剩下文學了。所以這本書的出版，讓近日的我起了罕有的積極。（王育德，1993[1983]：245；底線為引用者所加）

雖然《台灣海峽》遲至 1983 年才出版，但如作者所說，語言、文學、歷史，三個領域相互關連，因此研究也同時交叉進行；此亦即筆者在前述所強調的，王育德從事台灣話研究的一大目的乃在於建構台灣文學。而王育德的台灣文學觀，與他的語言及歷史研究不僅相互關聯，甚且是相輔而行的。以下論之。

### (一) 「台灣海峽」：作為一種文學史觀

從王育德的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灣海峽》，即可看出其文學史觀。《台灣海峽》第一章論析王拓與楊青矗的鄉土文學，內容改寫自〈戰後台灣文學略說〉及〈鄉土文學作家と政治—王拓と楊青矗を中心に〉這兩篇論文；第二章從陳若曦的作品探討台灣人的意識型態；第三章則討論吳濁流作品中的認同問題。就寫作時間來看，第三章早於前兩章，而二、三章原都曾連載於《台灣青年》。另外，「補說」之章收錄前述 1959 年的〈文學革命の台湾に及ぼせる影響〉，但篇題改為〈日本統治下の苦闘—言葉と文学〉；最後並附上作者編製的「台灣文學年表」與後記（王育德，1993[1983]：245）。

從章節與篇名即可知，王育德的台灣文學研究全面性地涵蓋戰前與戰後，而附錄的台灣文學年表，就資料搜集不易的當時來看，已是相當完整且具遠見的整理。《台灣海峽》中所論析的作品，或有以中國話寫作，或有以日語寫作，但作者不將他們排除於台灣文學的範疇之外，除了評點作品的優劣及可讀性，也對部份內容提出質疑。篇幅的關係，以下僅就王育德評論吳濁流的章節為例討論。

王育德以「台灣人必須隱藏身份嗎？」為題，總括他對吳濁流作品的評價，文中一再提醒讀者：「胡太明在遠渡中國之後，便一直隱藏其台灣人的身份」（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169），或者對日人肯定吳氏作品的背景提出批判：「吳氏所控訴的台灣人渾身血污，在日本人的處理下，卻完全被歸咎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他們認為日本的統治讓台灣人走了樣，只要台灣回歸中國，萬事可圓滿解決」（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173）。王育德直接指出，「導致胡太明發瘋的最大原因是對『祖國·中國』的幻想破滅，它同時也是對『祖國·中國』的一種諷刺」（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00）。亦即，王育德認為吳的作品受戰後對殖民地統治感到愧疚的日本人肯定，也得到心向大陸的台灣讀者之讚揚，乃出自於他們的意識型態與誤讀，而以為吳只管一味地揭示中國人／祖國意識。不過，無論是環境所迫而隱藏台灣人身份，或者認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原罪意識」，都是王育德不可苟同的。

事實上，王育德相當肯定作為一位具社會關懷的作家吳濁流，但他認為吳的「主體意識」不夠明確，因此無法深入問題的本質（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13）。例如《無花果》中描述的二二八，王育德亦提出強烈質疑：「二二八事件在吳氏眼中不過是「兄弟鬩牆」，這種說法令人不敢恭維」（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00）。王育德在《台灣 苦悶的歷史》中一再強調：「二二八事件大判亂，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關係帶來決定性作用的大事件。他們固然沒有喊出尋求獨立的明確口號，但『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叛亂如果成功，將會從高度自治走向分離獨立，這是

很自然的趨勢。」(王育德著、黃國彥譯, 2000a: 161-162) 也就是說, 王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與中國分道揚鑣的關鍵點, 而非只是中國史上常見的內亂事件。王育德的思考從二二八之後大轉變, 或許可用葉石濤的話來補足:

王育德先生當時的思想是左傾的, 他非常有興趣研究五四運動, 這可能是他在東京帝大唸「支那哲學」有關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戰後不久, 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會講北京話的時候, 王育德先生却能說一口字正圓腔的京片子。這當然是他在東京帝大辛苦學來的。從王育德的幾篇日文評論裡, 我們可以看出來他非常贊同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主張。簡言之, 他是反帝反封建的。這樣一個深愛「祖國」文化, 對「祖國」懷有溫熱夢想的台灣知識份子, 為什麼離開台灣到日本去以後, 變成否定中國人一切文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健將呢? 這是拜二二八所賜。(葉石濤, 1996: 44-45; 底線為引用者所加)

葉石濤認為王育德在二二八事件以前的思想「左傾」, 且是「反帝反封建」且熱愛「祖國」的; 而流亡後的王育德卻成為台獨運動者。也就是說, 二二八事件讓王育德和胡天明一樣對「祖國·中國」幻滅, 包括他視中國作為一個帝國侵略者的角色, 也包括如葉石濤所言其在戰後初期原就寫了不少「打倒孔家店」等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主張, 可以說, 王育德的「反帝反封建」的態度不僅是一貫的, 在二二八之後則更是積極且基進。這樣的台灣史觀, 在他評論文學作品時深刻地反映出來。

所以, 王育德如此批評《亞細亞的孤兒》中的觀點:

吳氏對於日據時代的「統治、被統治」關係有明確的認識, 因而熱情沸騰, 運用精湛的技巧寫成《亞細亞的孤兒》, 獲得成功而聲名大噪。

然則, 戰後蔣政權統治下的台灣, 難道沒有「統治、被統治」的關係嗎? 吳氏總不會認為所謂的「統治、被統治」關係只存在於不同民族之間, 在同一民族間不可能存在吧?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 2000b: 232)<sup>17</sup>

即便王育德認同台灣與中國之間屬於同民族, 他卻在此明確指出, 蔣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都一樣, 而日本和中國民族之於台灣的关系, 都是「統治、被統治」的關係。也因此, 王育德將書名題為《台灣海峽》, 並補充如此文學史觀:

<sup>17</sup> 此文原題為〈觀念的中國人と實質的台湾人のあいだ——吳濁流評その三〉, 刊於《台灣青年》第 169 期, 1974.04。

台灣海峽是台灣和中國之間隔絕的象徵。由於它的存在，台灣的歷史從中國乖離，台灣人的文學經營也和中國人相異。(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282)

王育德的台灣文學論著，終於明確揭舉了台灣文學因為歷史緣由，走向與中國文學相異的道路之觀點。綜言之，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史觀與其提出的台灣史觀一致，即無論是日本時代或是戰後的國府時代，台灣人都是被統治者；而台灣文學在日本時代跟上世界文學的主流而呈現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戰後則延續此「被統治」的殖民地文學之精神，發展出與中國文學完全背道而馳的文學面向。

## (二) 以台灣話作為台灣文學的語言主體

除了從歷史發展的面向，揭開不同於中國文學史觀的框架，王育德也從語言／語文的研究視角，來對不少當時仍為罕見的台灣文學論著提出糾正。尾崎秀樹 1963 年出版的《近代文學的傷痕》，堪稱是戰後第一本由日人寫作的台灣文學論，但王育德則直接指出尾崎文學論中的語言觀點的誤解：「尾崎先生把台灣人的『母國語言』，想像成是擺盪於台灣話與中國話（北京話）之間的語言」，並且進一步指出「解開日本時代台灣文學之謎的關鍵」：

對台灣人而言，母語就是台灣話，而中國話和日本話都算是外國語言，差別只在於，中國話與台灣話屬同個語系，所以學習起來比較輕鬆而已。而更重要的是，「台灣話只在口語方面有所進展，作為一個書面語，它還不夠成熟」。這一點，日本人或美國人很難理解，但解開日本時代台灣文學之謎的關鍵，就在其中。(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40)<sup>18</sup>

王育德認為，「台灣話只在口語方面有所進展，作為一個書面語，它還不夠成熟」；他更強調，「假若在思考日本時代的台灣文學史之前，能意識到語言文字的問題，則時代劃分或評價也會跟著不同吧」(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41)。換句話說，台灣話的書面語若能成熟發展，則台灣文學就不會在語言方面受到誤解，也不會再擺盪於其他語文之間。因此，他開拓的台灣文學救贖之道，即是台灣話的研究與文字建構。更明確地說，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的「語言主體」應該是台灣話，所以有必要解決台灣話的書寫問題。因此，他在文中不厭其煩地說明台灣話在口語和書面語的落差、中國白話文也行不通、台灣人不以台灣話書寫的原因等問題癥結所在，最後再強調台灣話的文字系統建立的必要性：

<sup>18</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28 期，1963.03。

若不能盡快找出合理的解決之道，則語言的混亂將難以收拾。因為光是現在，台灣就已存在著以日本話、北京話、英語，或者是混雜著各語言作為第二母語的不同世代，生活環境各異的台灣人，語言使用狀況也更加複雜。尾崎先生這本著作，甚至讓我連這些事情都聯想到了。（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49）

現今的台灣已成為多語社會，但無論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或是戰後乃至 1980 年代以前，以台灣話作為語言主體來書寫台灣文學的工程，都未能獲得完全的解決。至今，不僅語言主體轉移，面對更多新移民的語言，台灣話的語文建構面臨越來越複雜的難題。這些狀況，1960 年代的王育德已經預言並且預見。因此在當時，他就強調台灣話的文字系統之建立，除了必要性，還有急迫性，並且全身投入建構的工程。

### （三） 寬容而開闊的台灣文學史觀

雖然許多論者對王育德的評價，多聚焦於他在語言方面的貢獻，<sup>19</sup>且雖然王育德的論述觀點皆以台灣話為中心，包括他試圖建立台灣話的文字系統，並將這個語言推舉作為台灣文學的主體，甚至以政治性的語言宣示：「台灣有朝一日獨立，台灣話就會被制定為國語，用於任何公開場合」（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88）。然而，王育德的著作幾乎都以日語書寫，這當然是因為他長年居留日本，且為了訴諸《台灣青年》的言論於日本輿論最高階知識份子所然（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72）。<sup>20</sup>但恐怕也是因為這樣，王育德的台灣文學語言觀是較為開闊的，除了不抹殺以日語書寫的台灣文學，對於和台灣即便僅有些許關聯，卻以中國話書寫的作品，他是採取較開放的態度的。例如在評論外省作家王藍的暢銷小說《藍與黑》時，他肯定王藍的小說，謂「出乎意料之外地非常有趣」（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32），<sup>21</sup>這樣的肯定，即顯示他對不同語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所保有的寬容態度。當然，他還是藉機對外省作家未書寫台灣的心態提出指摘：

他們的目光總是向著大陸，像是思慕戀人那般思慕著失去的河山、失去的青春，台灣或台灣人或許根本不在他們眼裡。他們心裡想的，似乎只是如何才能早日回大陸，而在此之前要想辦法看怎麼樣應付台灣人而已。這部小說正反映出這樣的狀況，小說的場景移至台灣後，描寫篇幅大概有 50 頁，但當中卻完全沒提到任何關於台灣人的事。事實上，在台灣的外省人作家所創作的小說，沒有一部以台灣或台灣人為主題，僅止停留於自家文藝的活動。而這不僅是文藝界的現象，在

<sup>19</sup> 例如《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施俊州主編，台南：台南文化局，2014）中收錄的多篇論述。

<sup>20</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51 期，1965.02。

<sup>21</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3 期，1960.08。

學術界裡也不太關心台灣，在政治方面更是不用提了。

那麼，書寫台灣或者書寫台灣人的文學，究竟還是得靠台灣人自己了。所以，除了大家一起努力，恐怕別無他法。（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33）

蔣介石政權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台灣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王育德即提出「國台合作論」，期待外省人與台灣人共同攜手建立台灣共和國（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315）；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以後，《台灣青年》開始主張「凡是認同台灣為其祖國的，不管其出身籍貫如何，都是台灣人」（黃昭堂，2005：54）。因此，王育德對這些外省作家提出指摘，事實上是呼籲他們應該多將目光轉移至台灣、書寫台灣。換句話說，王育德認為，即便外省作家以中國話寫作，若能站在台灣的立場來書寫，則都是台灣文學。

另外，在評論鈴木明《沒人寫過的台灣》時，王育德對新一代作家使用的語言，一樣持著寬容態度：

文學的關鍵，終究還是在於心靈，技巧倒是其次。寫作者只要選擇自己較擅長的語言來書寫即可，如果無法用台灣話，年輕一代可以把中國話學好，來延續台灣文學的發展。只要他們不要失去台灣人意識，以過去學習日語的態度一樣來學習中國話，那也值得嘉許，沒什麼好擔心的。

即便是住在海外的台灣人，若能各自在僑居地以和台灣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題裁來創作小說，並且因此獲得好評，那麼也有可能回頭影響台灣。（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264）<sup>22</sup>

王育德認為，新一代的台灣人即便學習中國話，只要能夠保有台灣人意識並且書寫台灣，那麼他們也能成就優秀的台灣文學作品。

研究台灣話、主張台灣話應作為台灣文學主體的王育德，不僅以寬容的態度看待台灣文學的各種書寫語言，他於 1970 年代還創立了「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台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極力為台籍日本兵爭取權益，晚年也發表客語及原住民族相關研究及論述。<sup>23</sup>這些實踐，在在揭示王育德認知到台灣的族群及語言的多

<sup>22</sup> 原刊於《台灣青年》第 163 期，1974.05；《沒人寫過的台灣》於 1974 年 2 月出版。

<sup>23</sup> 王育德對客家語及高砂族的研究與論述各有一篇：〈客家語の言語年代学的考察〉一文收錄於服部四郎先生定年退官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1972）《現代言語学》（東京：三省堂）。〈タカサゴ族、進化それとも消滅〉連載於《台灣青年》第 285-286 期，1984.07-08。

樣性。倒是，對於台灣話，王育德也非常清楚且絕望地感嘆：

台灣話的研究，就算其成果成為台灣話的墓誌銘，或成為頌德碑，除了我之外，也沒有人要做了。在台灣，很了解或關心台灣話的人不少，卻不是從事台灣話學術性的研究的環境。這我所知如沙漠一般的環境，只會更加惡化，而不可能改善了。(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157)

即便現今台語已非台灣的主要語言，台語文學僅成為當中的一種文類，而非台灣文學的主流，但在那個時代，王育德認為若還來得及將「最大語族」的語言重新建構、寄望這仍是最多數人使用的語言能合理地成為「國語」、並以這個語言書寫台灣文學時，他願意，並且已經全力以赴。而這個「全世界最初的嚐試」(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124)，正是為了成就台灣人以台灣話寫出屬於可讓台灣人驕傲的文學作品，所開出的實踐之道。

## 五、結語

台獨聯盟要員、王育德的學生黃昭堂認為，王育德一生有四大貢獻，包括：一、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二、在日本諸多公立大學透過教育，增加日本人對台灣的了解；三、替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爭取補償；四、研究台灣話(黃昭堂，2000：1-2)。本論文要提出第五項，即王育德對台灣文學研究有極大的貢獻。

本論文將王育德在 1946 年發表的〈徬徨的台灣文學〉文中的「詛咒」疑問，視為他往後從事台灣話及台灣文學研究的原點；也是其台灣文學觀的建構基礎；並由此論析其在台灣文學研究上的成就與他的台灣文學史觀。簡言之，因殖民政策導致語言文字的發展受到阻礙，致使台灣作家無法寫出優秀的台灣文學作品，而面對這樣如宿命般的難題時，王育德直接從台灣話的研究著手，並改良既有的台灣話標記法，且更提出「漢羅混用」(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122)的主張，試圖讓台灣人在語文上的使用得到便利性，進而成就更具高度與厚度的台灣文學。

透過以上分析，本論文指出，就時間而言，王育德是戰後首位在日本發表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的學者，他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包括 1983 年出版的《台灣海峽》與多篇文學評論等，於台灣文學研究史上有著先驅性的意義，值得重新受到重視與肯定。第二，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與台語文字建構，包括他提出的「漢羅混用」之台語標記法，都不該只是放在「語言」的範疇來看；它雖是為了制定台灣獨立後的「國語」之準備，卻也

是王育德從戰後初期就開始試圖重建、發展台灣文學的奠基工作。

第三，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受台灣複雜的歷史發展影響，有著獨特的文學史流變。他認為清代就有台灣文學，即台灣在地的歌仔冊；而進入日本時代之後，它跟上世界文學的主流而呈現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戰後則延續此「被統治」的殖民地文學之精神，發展出完全與中國文學背道而馳的文學面向。第四，王育德認為台灣文學的語言主體應該是台灣話；但他也提出即便以日語或中國話書寫，甚至未來的語言環境更加複雜，只要作者具台灣意識，則無論使用何種語言書寫，都是台灣文學。

（責任校對：游佩芸）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a，《台灣 苦悶的歷史》，台北：前衛。[Ong, Iók-tik. (2000a). *TAIWAN: A History of Agonies* (Kuo-yen Huang, Trans.). Taipei: Avant-garde Publisher.]
-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b，《台灣海峽》，台北：前衛。[Ong, Iók-tik. (2000b). *Taiwan Strait* (Kuo-yen Huang, Trans.). Taipei: Avant-garde Publisher.]
-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c，《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Ong, Iók-tik. (2000c). *Taiwanese Lecture* (Kuo-yen Huang, Trans.). Taipei: Avant-garde Publisher.]
- 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2017，《漂泊的民族 王育德選集》，台南：台南文化局。[Ong, Iók-tik. (2017). *Vagrant Nation: Anthology of Ong Iók-tik* (Bí-chhin Lī, Ed. & Trans.). Tainan: Tainan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呂美親，2015，〈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收錄於吳蘭梅總編輯，《賴和·台灣魂的迴盪——2014 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355-420。[Lī, Bí-chhin. (2015). Kundoku, Imitation, Innovation, and Written Vernacular Taiwanes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aiwanese Writing Style under Japanese Rule. In Lan-mei Wu (Ed.), *Lai He, the Spiraling of Taiwan Soul: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Conference of Changhua Studies* (pp. 355-420). Changhua: Changhua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余佩真，2006，《王育德的文學、語言、歷史觀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Yu, Pei-chen. (2006). *A Study of Ong Iók-tik's Literature, Language, Historical Standpoint*.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 吳新榮，1946，〈文化在農村〉，《台灣文化》，第 1 卷第 1 期，頁 21。[Ngôo, Sin-îng. (1946). Culture in Rural Area. *Taiwan Culture*, 1(1), 21.]
- 施俊州主編，2014，《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台南：台南文化局。[Si, Chùn-chiu. (Ed.). (2014). *The Anthology of Ong Iók-tik Memorial Lecture*. Tainan: Tainan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洪惟仁，2014，〈第一位閩語學博士——王育德小傳〉，收錄於施俊州主編，《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台南：台南文化局，頁 85-95。[Ang, Ui-jin. (2014). The First Doctor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Ong Iók-tik. In Chùn-chiu Si (Ed.), *The Anthology of Ong Iók-tik Memorial Lecture* (pp.85-95). Tainan: Tainan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徐亞湘，2015，〈省署時期台灣戲劇史探微〉，《戲劇學刊》，第21期，頁73-95。[Hsu, Yahsiang. (2015). An Exploration of Taiwan Drama History during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Period. *Drama Journal*, 21, 73-95.]
- 陳建忠，2007，〈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Chen, Chien-chung. (2007). *Cursed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1945-1949)*. Taipei: Wu-Nan Book Inc.]
- 黃昭堂，2000，〈黃昭堂序〉，收錄於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Ng, Chiau-tông. (2000). Preface. In Iók-tik Oông, *Taiwanese Lecture* (Kuo-yen Huang, Trans.) (pp.1-2). Taipei: Avant-garde Publisher.]
- 黃昭堂，2005，〈日本的台獨運動〉，收錄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主編，《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頁51-58。[Ng, Chiau-tông. (2005).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Japan. In Yen-hsien Chang, Chiu-mei Zeng & Chao-hai Chen (Eds.), *Awaken and Identif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f Overseas Taiwanese Movement (1950-1990)* (pp. 51-58). Taipei: Wu San-lien Taiw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oundation.]
- 曾進民，2002，〈王育德台灣語研究之成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Zeng, Chin-min. (2002). *The Achievement of Ông Iók-tik's Research on Taiwanes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Yeh, Shih-tao. (1987). *Outline of Taiwan Literature*.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er.]
- 葉石濤，1996，《府城瑣憶》，高雄：春暉。[Yeh, Shih-tao. (1996). *Memories of Tainan*.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er.]
- 葉石濤，2000，《舊城瑣記》，高雄：春暉。[Yeh, Shih-tao. (2000). *Memories of Kaohsiung*.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er.]

## 二、日文書目

- 王育德，1993[1983]，《台灣海峽》，東京：日中出版。[Oông Iók-tik. (1993)[1983]. *Taiwan Strait*. Tokyo: Nicchu-shuppan Publisher.]
- 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2011，《「昭和」を生きた台湾青年》，東京：草思社。[Oông Iók-tik. (2011). *The Taiwan Youth Living in Syowa* (Meiri Kondo, Ed.). Tokyo: Soshisha Publisher.]

- 王育德原著、近藤明理、近藤綾、中川仁編，2012，《王育德の台湾語講座》，東京：東方書店。[Ong Iók-tik. (2012). *Ong Iók-tik's Taiwanese Lecture* (Meiri Kondo, Aya Kondo & Jin Nakagawa, Eds.). Tokyo: The Eastern Publisher.]
- 大東和重，2016，〈王育德の台湾語事始め—「歌仔冊」と「歌仔戲」—〉，發表於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承辦之「台日『文學與歌謠』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4-5日。[Ohigashi, Kazushige. (2016). The Beginning of Ong Iók-tik's Taiwanese: Kua-á Books and Kua-á-hi (Taiwanese ope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Song in Taiwan and Japan. Tainan, Taiwan. June 4-5.]
- 岡崎郁子，2002，〈王育德の戦後初期思想と文芸〉，《吉備国際大学社会学部研究紀要》，第12號，頁223-234。[Okazaki, Ikuko. (2002). Ong Iók-tik's Thought and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Journal of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12*, 223-234.]
- 岡崎郁子，2014，〈王育德と邱永漢—その文学と確執〉，收錄於蔡錦堂主編，《台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頁147-164。[Okazaki, Ikuko. (2014). Ong Iók-tik and Kyu Eikan: The Literature and Discord. In Chin-tang Tsai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aihoku Koukou* (pp. 147-164).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河原功，2014，〈台北高等学校の文学世界—『翔風』『足跡』『南方文学』を軸として〉，收錄於蔡錦堂主編，《台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頁93-126。[Kawahara, Isao. (2014). The Literary World of Taihoku Koukou: A Focus on *Shohu*, *Footprint* and *South Literature*. In Chin-tang Tsai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aihoku Koukou* (pp. 93-125).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下村作次郎，1994，《文学で読む台湾 支配者・言語・作家たち》，東京：田畑書店。[Shimomura, Sakujiro. (1994). *Taiwan in Literature: Ruler, Language and Writers*. Tokyo: Tabata-shoten Publisher.]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2014，《台湾近現代文学史》，東京：研文出版。[Nakajima, Toshiwo, Kawahara, Isao & Shimomura, Sakujiro (Eds.). (2014).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 Literature*. Tokyo: Kenbun-shuppan Publisher.]

## **Breaking the Curse of “Language”: Ông Iók-tik’s Construc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he Viewpoint of History**

**Lī, BÍ-chhin**

**Contra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Irresolute Taiwan Literature” proposed by Ông Iók-tik in 1946 inquired about the presence of a “curse”. This treatise was regarded as the original focus for which the research on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Taiwan literature was carried out. First of all, the treatise indicates that Ông Iók-tik’s research on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words should not only be taken as a category of language,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rebuilding Taiwan literature. Second, as the first scholar issuing a treatise for researching Taiwan literature, Ông Iók-tik’s is seen as a pioneer for hi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his research is worth re-evaluating and praising. Third, Ông Iók-tik considered that Taiwan literatur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it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has possessed a uniqu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over time. He also mentioned that Taiwan literature had been around in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and then embodied the spirits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after ente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keeping pace with the main stream of world literature. After World War II, Taiwan literature continued to embody the spirits of colonial literature and developed completely different trends compared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Fourth, the main languag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Ông Iók-tik’s point of view, should be Taiwanese; however, he also mentioned that Taiwan literature can be written in Japanese,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s because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may be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fu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writers have a true awareness of Taiwan.

**Keywords:** Ông Iók-tik, Taiwanese, language, colonial literature, Taiwan literature